

# 从中美贸易摩擦透视中国与世界经济变革

龚秀国

(四川大学 经济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革: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进入经济衰退的困境,而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则快速崛起,中国更是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与第一大贸易国。研究认为,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既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经济实力与战略的较量,又是长期以来世界贸易不平衡、国际资本逆向流动与国际经济话语权争夺等三大突出问题的集中反映。研究还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贡献者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并实质性地扩大甚至引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同时采取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策略促使“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深度融合,保持并推动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建设性磋商,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平台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世界经济更为开放、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美经贸;贸易摩擦;世界经济格局;新兴市场;守成大国;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9)05-0010-10

## China's and global economic refor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US trade conflicts

GONG Xiuguo

(School of Economic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5, Sichua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comprehensive breakout of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S in 2008, the global economic pattern has undergone a transformation: US, Japan, EU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entered the plight of economic downturn, while emerging Asian markets such as China and India rose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China emerged rapidly as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y, the largest

收稿日期:2019-05-25

基金项目: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R41)

作者简介:龚秀国(1965-),男,四川广安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industrial producer and the largest trading nation of the world. Study holds that 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s breaking out in 2018 not only symbolize a contes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terms of economic strength and strategy, but also reflect three prominent issues of the world trade imbalance, the reversal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discourse power of global economy. This study also concludes that as the beneficiary and contributor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s well as a rapidly growing emerging power, China should open up its domestic markets more actively and substantially, integrat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th the pilot free trade zones in China more profoundly by way of focused breakthrough and leading comprehensive growth by drawing upon the experience of key developments, maintain and promote more constructive dialogues with the US, Japan, EU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and regions as well as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such as the BRICS, fully utilize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platforms such as the G20 to jointly promot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reforms in WTO, and ensure a more coordinated, op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world economy.

**Key words:** Sino-US trade; trade conflict; global economic pattern; emerging market; incumbent power; opening-up;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2018年,毫无疑问将成为新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年。一方面,距离1978年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已然40周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非凡成就,完全可圈可点和可喜可贺,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与第一大贸易国,从而创造了世界银行所称的“中国经济奇迹”;另一方面,“福兮祸所依”,伴随中国等新兴市场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获得巨大发展,在改变自己的同时又在影响和改变自己所处的世界,促使世界经济格局开始面临和酝酿重大变革,美国作为东西方“冷战”结束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和现行国际经济体系的守成大国却在“美国优先”执政理念下悍然开启所谓“逆全球化”趋势,并针对不断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单方面挑起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并有愈演愈烈与不断扩大之势,中国再一次被推向了重要变革与历史转折关口。

面对中国不可阻挡的快速崛起,美国政府白宫贸易顾问 Navarro et al. 早就提出骇人听闻的所谓“中国致死”说,他们认为中国与美国在贸易、经济与战略领域存在根本性冲突,中国是现行由美国领

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根本性破坏力量<sup>[1]</sup>。也正因为如此,2017年1月刚上台执政的特朗普政府旋即在当年12月推出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中将中国(与俄罗斯)列为可以全方位挑战美国利益的“战略对手”,中美经贸摩擦似乎已箭在弦上。2018年美国直接对华发动大规模贸易摩擦。然而,遗憾的是,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却认为这是特朗普总统商人本性的变幻莫测与小打小闹,尚不至于危及或者影响相互依存和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当2018年美国抛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依据美国国内贸易立法单方面针对中国发动二战后最大规模贸易摩擦之后,国内不少专家学者仍然还沉迷于中美经贸关系“牢不可破”的幻想之中。

纵观国内外研究文献,它们主要立足于已经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大多局限于从实证研究角度分析探讨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比如, Rosyadi et al. 利用 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模型探讨了特朗普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的影响<sup>[2]</sup>,周政宁等又利用动态 GTAP 模型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影响<sup>[3]</sup>,肖志敏等还从贸易增加值视角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sup>[4]</sup>,郭晴等甚至利用动态 CGE(Competitiv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进一步探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效应<sup>[5]</sup>;此外,Guo et al. 评估测算了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摩擦的代价<sup>[6]</sup>,崔连标等则进一步分析评估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sup>[7]</sup>,等等。

与现有文献大多注重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量化分析不同,本文立足于新时代世界经济格局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密切结合当今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力求通过多角度理论分析透视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进而探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变革动因及发展趋势,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经济海洋中明确变革方向与变革策略。

## 一、新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格局 不断酝酿重大变革

现行国际经济体系来源于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主导召开的国际经济会议所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Bretton Woods Agreement)。作为全球最富裕、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20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雄踞世界的第一大经济体,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进一步鹤立鸡群。《布雷顿森林协议》正式确认并名正言顺地赋予美国在二战后国际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领导地位,美国经济霸权与金融霸权由此确立。

众所周知,《布雷顿森林协议》建立了后来被称为二战后促使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飞速发展的三大支柱,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即当今“世界银行”的前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即当今“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三大国际组织机构。根据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不仅美元名正言顺地取代英镑成为与黄金直接挂钩的国际货币或者世界货币,“美元特权”(Dollar Privilege)<sup>①</sup>由此诞生,而且美国按照其认缴的份额与表决权“理所当然”地成为二战后在以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唯一拥有“否决权”的经济大国。尽管1973年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黄金被逐出货币领域,世界由此进入信用货币时代,但是美国依然凭借与最大产油国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的“石油-美元”协议(即以美国军事保护换取沙特石油出口用美元计价结算),最终确保了美元在当今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美国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高盛(Goldman Sachs)、大摩(Morgan Stanley)、美林(Merrill Lynch)为代表的华尔街五大金融翘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仅存上述3家)以及以标普(Standard and Poor's)、穆迪(Moody's)和惠誉(Fitch)为代表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话语权和霸权。

与此同时,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实际上领导和推动了以贸易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所谓“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通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主持的总共8个回合的多边自由贸易谈判,不仅大幅度削减了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使发达国家关税平均水平降至3.8%,发展中国家关税平均水平降至10%,而且根据第八个回合即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成果,于1995年1月1日建立了管辖范围更广、仲裁权力更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来取代GATT这个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临时性机构;不仅过去长期被排除在外的农产品、纺织品与服务贸易一同纳入了WTO管辖范围,而且与贸易直接相关的知识产权、投资措施、环境保护甚至劳工标准等都纳入了WTO管辖范围,同时强化了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与权力。

进入21世纪以来,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在2001年遭遇了举世震惊的“9·11”恐怖袭击,在全球范围内“反恐”迅速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第一要务,世界战略格局由此发生重大改变,中国也获得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快速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此后,美国不断深陷“反恐战争”泥沼不能自

<sup>①</sup> “美元特权”系20世纪60年代法国总统戴高乐所创,是指美国可以通过发行成本几乎为零的美元来购买其他国家重要资产和商品(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或者世界货币)。

拔,先后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发动了一系列耗资巨大却久拖不决也不成功的所谓“反恐战争”,同时资助和鼓动中东地区乃至东欧国家进行所谓“颜色革命”,以重塑整个阿拉伯世界乃至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这既大量消耗了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积攒起来的财政能力,又严重透支了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的国际形象。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并迅速扩散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欧盟、日本等一同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市场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实现整体性崛起<sup>[8]</sup>,世界经济格局从此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G7)主宰世界经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更有代表性、包括中国等全球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二是长期以来作为成功市场经济典范的“美国经济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充分发挥政府在产业与经济规划中重要作用的“中国经济模式”越来越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青睐。

特别地,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持续衰退不同,中国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仍然保持“一枝独秀”,并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第一大贸易国与第一大外汇储备国。2017年,中国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已经超过12万亿美元,达到美国GDP的2/3,即便按照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较低的6.5%与美国经济运营良好的2.5%增长率计算,中国也将在2025年左右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sup>①</sup>。

作为一个拥有5 000多年不间断文明史、目前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更是展现了自己的稳健成熟与国际担当,国家信誉与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因势利导地实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外向型、速度粗放型向内需型与质量效益型转变,2012年又进一步进行经济政策顶层设计,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五大发展新理念,坚决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中国制造2025》高科技产业发展纲要,切实

打好“防范金融风险、保护生态环境、精准扶贫”三大攻坚战,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另一方面,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积极主动地回馈国际社会并与时俱进地向国际社会提供经济复苏所急需的国际公共物品,在参与和推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与国际经济治理改革的同时,又于2013年进一步提出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

“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立足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向东与向西开放并举、以周边国家为依托,致力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能源合作及产业产能合作,迄今已得到包括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在内的8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和大力参与;6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成绩斐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路上。

## 二、从中美贸易摩擦透视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三大突出问题

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席卷整个西方世界,不仅促使西方发达国家一同陷入二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促使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快速崛起,世界经济版图与世界经济格局也从此酝酿重大改变。作为现行国际经济体系守成大国与世界经济领导者,美国学术精英与政治精英开始全面反思与重新审视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2009年上台执政的奥巴马(Barrack Obama)政府充分利用“美元特权”并通过接二连三的巨额“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转嫁危机,美国经济最终得以在2015年全面复苏,不过“再工业化”与企业回流却收效甚微,美国政府也随之将已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而且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者”;2017年上台执政的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则更进一步,不仅直截了当地把中国、俄罗斯确定为可以全方位影响美国利益与

① 尽管如此,中国人均GDP与美国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比如,2017年中国人均GDP接近9 000美元并进入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也只是美国的1/5。

价值观的“战略对手”,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全面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内实施大规模减税来推动再工业化与企业回流,对外则开启所谓“逆全球化”趋势,试图通过“单边主义”“贸易霸凌”甚至单方面发动大规模贸易摩擦来重塑世界经济贸易秩序和维护美国全球霸主地位。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与守成大国,美国 2018 年针对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新兴大国的中国单方面挑起的二战后最大规模的中美贸易摩擦,毫无疑问具有非常典型的代表意义,因为它既真实地反映了伴随如火如荼的经济全球化现行国际经济体系长期存在却没有很好解决的三大结构性问题,又同时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不平衡发展以及不可持续的问题。

## (一)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

特朗普政府发动对华贸易摩擦的借口来源于 2017 年美国 301 调查报告,它指控中国政府通过所谓“强制性技术转让”(从而违反美国国内贸易法针对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特别 301”条款)与“对美国企业与产品设置障碍”(从而违反美国国内贸易法针对阻碍美国企业产品市场准入的“超级 301”条款)等“不公平”贸易行径谋取了巨大贸易利益,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长期居高不下并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一半以上。

作为全球最大也最具代表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对美国拥有长期的、较大的贸易顺差的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与其像美国执政当局那样简单粗暴甚至牵强附会地从微观视角将中美贸易不平衡归咎于中国单方面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径,倒不如从国际货币制度、宏观经济理论以及美国出口政策角度看得更清楚明了。比如,邓菊秋等就从理论与实证角度研究表明,美国长期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与严格出口管制政策是造成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两大重要原因<sup>[9]</sup>。

一是美元作为当今世界最主要国际货币的直接结果,也是“美元特权”的具体体现。在现行国际

经济体系中,美国是国际货币美元的唯一发行国,有责任和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足够多的流动性满足国际社会交易与储备需求,而保持经常账户逆差特别是贸易逆差则是美国向国际社会提供流动性的主要途径,即美国主要通过发行美元购买他国商品来满足他国对国际货币美元的需求(与此相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以及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通过保持贸易顺差来获取自身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美元货币的)。当然,美国长期贸易逆差无疑会导致美元贬值,进而损害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信誉,这就是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Triffin 发现并命名的“信心问题”<sup>[10]</sup>,即国际经济学上著名的“特里芬悖论”。

二是美国超低的国民储蓄率与中国超高的国民储蓄率。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储蓄率从 1970 年的 13% 稳步下降至 2017 年的 2.7%,国民消费则急剧膨胀,2017 年已达 GDP 的 70%。与此相对,中国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偏爱储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在 30% 以上。按照国际经济学理论或者开放条件下国民收入会计恒等式,任何国家国民储蓄只能借与私有部门投资、公共部门开支以及外国净需求,即  $S(\text{国民储蓄}) = I(\text{私有部门投资}) + BD(\text{政府预算赤字}) + CA(\text{本国净出口})$ 。因此,即便是在预算平衡的前提下,美国也只能通过向中国等高储蓄率国家大举借入或者保持经常账户较大逆差特别是保持较大贸易逆差才能弥补本国储蓄严重不足的巨大资金缺口,而中国则通过大规模借出或者保持经常账户顺差特别是贸易顺差来有效利用本国过高储蓄资金并维护国内市场平衡。

三是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使然。伴随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美国凭借人才、资本、市场以及制度优势逐步向全球价值链最高端即全球创新中心挺进,并理所当然地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创新中心,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也跻身为以高端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德国等西方国家很多标准化的、中低端加工制造产业不断丧失竞争优势,逐步向中国等劳动力成本明显偏低的新兴市场转移和聚集,中

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快速成长为“世界加工厂”,美国“去工业化”或者“产业空心化”进一步加剧,美国也日益依赖进口中国等新兴市场生产制造的大量质优价廉商品,日本、德国等过去对美国长期拥有的巨额贸易顺差也伴随产业转移至少部分地转移至中国。

四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严格出口管制政策也起了很大作用。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出于国家战略需要一直没有放弃针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管制政策,而在不断形成并日益强化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基本上丧失了与中国在普通消费品制造方面的竞争优势,只能在高科技产品领域维持较大竞争优势。因此,面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奋起直追,美国基于冷战思维的严苛出口管制政策反而进一步恶化甚至加剧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

## (二)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资本逆向流动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除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日益严重的贸易不平衡之外,经济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世界经济格局中另一个与之伴生的经济现象,那就是国际资本反而从贸易盈余较大、外汇储备丰富的新兴市场国家流向长期贸易赤字的发达工业化国家,这与过去国际资本大多是从发达国家流向新兴市场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理念大相径庭。

当然,新兴市场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绝大部分是通过购买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国债的方式从新兴市场国家重新流回西方发达国家的。毫无疑问,这些西方国家主权债券具有信用等级高、流动性高的特点,能够在当今信用货币时代很好地满足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支付需求,同时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支付能力与国际信誉的保障,但是它们也因此不能带来多少投资收益,甚至在不少情况下是负的收益。

以中国为例,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伴随外来直接投

资大规模涌入,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中国也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债权国,到2014年底中国积聚的外汇储备已达3.98万亿美元,超过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已接近中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

尽管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可以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支付能力与国际信誉,预防类似1982年世界“债务危机”或者1996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发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但是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或者国际资本逆向流动无疑也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一是巨额外汇储备可能因发达国家“超宽松”货币政策而大幅度贬值或者使其购买力大幅度下降,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美国、英国、欧盟、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推出巨额“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英镑、欧元、日元等大幅度贬值,也大幅度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从而使新兴市场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度缩水;而这正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最不公平的地方,也极大地刺激了新兴市场国家力主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以限制和约束发达国家滥用国际货币发行权的共同呼声。二是巨额外汇储备也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巨额机会成本损失。三是新兴市场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或者国际资本逆向流动本身就相当于贫穷落后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补贴富裕发达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公正性。

## (三) 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问题

自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并持续扩散以来,伴随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一同陷入衰退,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却在金融危机之后实现了整体性崛起;伴随西方世界与新兴市场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二战后持续半个多世纪并完全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与世界经济格局也开始面临重大调整,二十国集团随之取代自20世纪70年代以

来七国集团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中国等新兴市场大国自然也寻求在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中拥有更大代表性与更多发言权。

实际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无疑是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也是世界经济最主要引擎。然而,自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改变。尽管美国依然是世界经济领导者,但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相继陷入衰退,美国经济模式也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接二连三地推出颇受争议的“量化宽松”政策来以邻为壑和转嫁危机。与此相对,在全球流动性泛滥与输入性通货膨胀等巨大压力下,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反而实现整体性崛起,中国不仅迅速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与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更是一枝独秀,进而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引擎,中国经济模式也开始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青睐,从2012年到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到34%,超过美国、欧盟与日本贡献率之和<sup>①</sup>。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流动性泛滥等不利影响,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无疑希望改革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更好地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权益,同时遏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滥用国际货币发行权转嫁经济金融危机并肆意侵害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sup>[11]</sup>。然而,作为当今国际经济体系唯一拥有否决权的经济领袖与守成大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多次讨价还价之后最终只同意象征性地对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出让世界银行与IMF不足5%的份额及投票权,而且出让份额基本上都是来自欧盟国家,美国依然处于一家独大或者唯我独尊的霸主地位。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典型代表,中国当然希望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与自身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中国政府也一再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即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会称霸,更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权。但是,美国始终把中国看作是推行全球霸权潜在的最大战略对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两大最主要引擎之一,2017年中

国经济总量已占世界15%,但中国在世界银行和IMF所占份额仍维持在5%左右。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2010年便申请将人民币纳入IMF“特别提款权”(SDR),美国当时以“人民币不符合条件”为由直接否决,5年后即2015年在中国背水一战并顺利完成著名的“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才获准纳入SDR货币篮子。特别是按照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相关条款之规定,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在中国入世15年之后自动放弃“援用第三国”做法来针对中国商品实施反倾销,亦即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自2012年以来到目前为止,美国政府不仅公开声明自己拒不承认,而且一直要求欧盟、日本等西方盟国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为了及时有效地满足亚洲等欠发达地区对发展经济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求,也为了弥补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发展资金供给严重匮乏的不足,中国因势利导地在2013年提出了宏大的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并主导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开放型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尽管遭遇了美国的反对和阻扰,“一带一路”建设却得到了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众多亚洲域内外美国传统盟友的积极响应和广泛参与,5年来成绩斐然,不仅使中国投资、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以及中国影响力不断扩大,还越来越成为开放合作与互利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典范平台。

### 三、应对世界经济格局重大变革调整的中国策略探讨

#### (一) 中国更应积极主动并实质性地扩大国内市场对外开放,以引领全球共建创新、包容与开放的世界经济

改革开放是中国政府自1978年以来确立的基

<sup>①</sup>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测算,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为10%,欧盟为8%,日本为2%,中国高达34%,超过美国、欧盟、日本三者贡献率之和。

本国策,中国经济也从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相互促进中获得巨大发展。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更是快速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与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改变了自己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版图,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正在全球共建创新、包容与开放的世界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毫无疑问,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永远不会走回头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而且只会越开越大。特别地,与2001年中国全面加入美国领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时人均收入仅1 000美元相比,中国2017年人均收入已超过8 800美元,并自豪地跻身为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因此,针对当今甚嚣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以及逆全球化趋势,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有能力也有义务顺应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历史趋势,向世界积极主动地展现新兴大国的国际担当,这既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回馈国际社会并推动建立更加开放包容与合作共赢的世界经济的责任担当。

一方面,中国政府将力主从制度与制度创新上把扩大外国商品进口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且越来越富裕的大市场,中国积极主动地扩大进口是现阶段国内消费升级趋势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面向世界与未来、促进全球合作共赢与共同发展的外在需求。

为此,中国政府将积极有效地促进居民收入增加与消费能力增强,培育国内消费升级与中高端消费新增长点,持续释放国内市场潜力,积极拓展外国商品进口空间;进一步削减甚至大幅度降低进口商品关税与关税总水平<sup>①</sup>,削减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促进进口商品通关便利化,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等新业务发展;持续举办中国在全球首创的、专门以进口为主题的中国进口博览会(CIE),力争办出水平、办出成效,且越办越好。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将在确保国家安全前提下根

据产业承受能力与国际惯例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和放宽外资准入限制,从而鼓励竞争与提升效率。实际上,与商品贸易存在较大顺差完全不同,中国服务贸易一直存在较大逆差,但中国政府一直在持续推进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对外开放;既在深化农业、采矿业与制造业的对外开放,又在逐步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对外开放步伐,在那些外国投资者较为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医疗等领域也将进一步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此外,中国将加快出台外商投资法规,进一步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全面深入地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与此同时,中国将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 (二) 中国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保持积极的建设性磋商,并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平台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既会给拥抱它的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与经济繁荣,又会产生新的收入分配与环境保护等问题,同时还可能加剧社会不公与贫富悬殊。因此,不论是富裕的发达国家还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都共同面临着如何有效兴利除弊与扬长避短问题。

跟美国中产阶级在金融危机后遭受较大冲击一样,中国既不是经济全球化理所当然的受益者,也不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因为中国“农民、农业、农村”等“三农”问题、粮食安全问题、能源安全

<sup>①</sup> 根据《证券日报》与《经济日报》报道,中国已从2017年12月1日起以暂定税方式降低部分消费品进口关税,涉及187个8位税号各类消费品,平均税率由17.3%降至7.7%,以缓解国内每年上万亿元的消费外流;特别是进入2018年以来,中国政府持续释放“扩大进口”的政策信号,迄今已实施4次自主降税,中国关税总水平也由上年的9.8%降至今年的7.5%。

问题甚至信息安全问题无疑是遭受经济全球化冲击较大的行业领域。尽管如此,作为全球最大新兴市场,中国仍然坚信这些问题只是经济全球化的次要问题或者发展中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现行的多边机制特别是国际社会的平等协商得到逐步与合理解决,自然不会诉诸于单边的贸易保护主义,更不会以此为由发动大规模贸易摩擦。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与最大新兴市场,中国一贯主张并坚定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和维护多边主义,这不仅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是中国快速崛起之后义不容辞的义务。当然,存续 20 多年的世界贸易组织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中并不能自我完善和与时俱进,中国应积极支持并愿意与美国等广大国际社会一道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共同捍卫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让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机构能够更大程度地照顾更多国家的重要关切与利益诉求,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积极贡献。

特别是,中国应一如既往地支持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APEC)、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BRICS)等机制平台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推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议,加快中国-欧盟投资协定谈判,加快中国-日本-韩国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并认真贯彻落实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的“八大行动”。

**(三) 中国应采取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策略,促使“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深度融合,进而成为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并实现开放共赢的国际合作典范**

事实证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担忧的地缘政治工具大相径庭,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更多是一个立足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向东向西开放并

重、以周边国家为依托的开放型国际合作平台,主要致力于中国与亚洲及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即互联互通建设)、资源能源合作与产业产能合作,是中国回馈国际社会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全世界提供的一个国际公共物品。为此,中国还进一步主导创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丝路基金等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支持机构,特别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更是吸引了英国、法国、德国等一大批亚洲区域之外的美国传统盟友的积极响应与大力参与。

迄今为止,中国已先后在上海、天津、广州、西安、成都、武汉、海南等建立起 12 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它们无疑将承担和发挥中国深入推进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中国将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增设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进投资与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进行大胆创新与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实用经验,同时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并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此外,海南也将分步骤、分阶段地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贸易港,相关政策与制度体系正在加紧制定过程之中。

特别地,中国将支持沪宁杭等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着力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与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大力打造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推进更高起点的经济改革与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最终同“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相互配合,进而完善中国全方位改革开放的整体空间布局。

当然,中国将秉承和坚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同相关国家一道共同推进“中欧班列”“经济走廊”“中国工业园区”等具有典型示范效应的重大项目建设,同时搭建更多贸易促进平台,鼓励更多有实力、信誉好的中国企业到沿线国家开展投资合作,加强和深化生态、科技、文化、民生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为亚洲、欧洲乃至世界各国提供开放合作、互利共赢

的国际平台。

四、结语

本文立足于世界经济格局演变的独特视角,从多个理论维度分析透视了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对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变革方向进行了初步探讨。

文章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既是实力相对下降的守成大国美国与影响力不断上升的新兴大国中国之间经济与战略较量,又是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不平衡、可持续发展的集中反映。在此背景下,中国一定要有坚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战略定力,“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让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添砖添瓦。

我们相信,中美两个大国一定有能力、有智慧在不远的将来最终达成互利共赢的贸易协定,这不仅将造福于中美两国人民,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待,更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

参考文献:

[ 1 ] Navarro P, Autry G. Death by China: confronting the dragon——a global call to action [ M ]. Hoboken: Pearson FT Press, 2011.

[ 2 ] Rosyadi S A, Widodo T. Impact of Donald Trump's tariff

increase against Chinese imports on global economy: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 GTAP) model[ J ].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2018, 16 ( 2 ): 125-145.

[ 3 ] 周政宁, 史新鹭. 贸易摩擦对中美两国的影响: 基于动态 GTAP 模型的分析[ J ].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35 ( 2 ): 20-31.

[ 4 ] 肖志敏, 冯晟昊. 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视角[ J ]. 国际经贸探索, 2019, 35 ( 1 ): 55-69.

[ 5 ] 郭晴, 陈伟光. 基于动态 CGE 模型的中美贸易摩擦经济效应分析[ J ]. 世界经济研究, 2019 ( 8 ): 103-117, 136.

[ 6 ] Guo M, Lu L, Sheng L, et al. The day after tomorrow: evaluating the burden of Trump's trade war[ J ]. Asian Economic Papers, 2018, 17 ( 1 ): 101-120.

[ 7 ] 崔连标, 朱磊, 宋马林, 等. 中美贸易摩擦的国际经济影响评估[ J ]. 财经研究, 2018, 44 ( 12 ): 4-17.

[ 8 ] 高祖贵. 亚洲整体性崛起及其效应[ J ]. 国际问题研究, 2014 ( 4 ): 9-21, 131.

[ 9 ] 邓菊秋, 龚秀国. 从美国货币政策看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J ]. 四川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1 ( 6 ): 82-89.

[ 10 ] Triffin R.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 M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0.

[ 11 ] 龚秀国.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美元汇率战略对我国影响研究[ M ].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